

邓小平社会矛盾论的显著特点

张屈征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社科系,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论述了邓小平同志社会矛盾论的显著特点:找到体制障碍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把改革开放作为解决基本矛盾的具体途径;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中对待国际经验;突破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两分法模式,从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出发处理矛盾;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等。

[关键词] 对立与统一;社会基本矛盾;两分法及矛盾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Deng Xiaoping's sociality contradiction's prominence characteristics

ZHANG Qu-zheng

(Dept. of Social Science, NW Inst. of Arch. Eng.,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prominenc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ng Xiaoping's sociality contradiction. Firstly, Deng Xiaoping discover system obstacle is incorporate of sociality basic contradiction in our country socialism primary phase and specific approach of solving basic contradiction is innovation opening; secondly, he trea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experience from contradiction both oppose and unify; thirdly, he break through dichotomy pattern about sociality contradiction, he deal with contradiction from sociality contradiction's multiiformity; finally, he search after China's developmental way in point of view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unification.

Key words oppose and unify; sociality basic contradiction; dichotomy and contradiction's multiiformity; unive 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当代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关系,把这一方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发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的表现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发现。但他老人家对“不适应”的地位和表现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他淡化了“不适应”一面的重要性,把“不适应”作为“根本上是适应的”这一主要方面的附属规定,从而淡化了改革的必要性,这是我们过去很长

[收稿日期] 2000-09-27

[作者简介] 张屈征(1961—),男,陕西乾县人,西北建筑工程学院讲师,从事经济哲学研究。

时期没有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和实质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当他晚年重视“不适应”这一面时,又错误地把所有制及其分配方式不是纯粹公有制、存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党内存在资本主义代表人物等因素作为“不适应”的表现,从而把阶级矛盾当成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当成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解决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1]。

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究竟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只能是空谈发展生产力,甚至破坏生产力。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找错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的表现,发展生产力的路子不对。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邓小平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依据,认真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教训,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进行深入观察后逐步认识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僵化的经济体制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僵化的政治文化体制上;僵化的体制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这场革命即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大经济的需要^[2]”,“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决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可见邓小平同志把体制改革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

二、在认识和处理国际国内矛盾时,善于从同一中把握对立、从对立中把握同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同一;同一与对立相互联结,对立寓于同一之中,同一以对立为基础。这要求我们在认识问题时既要看到对立,又要看到同一;要善于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邓小平同志深刻理解这一辩证法,他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国际关系的辩证艺术给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对于认识处理未来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 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善于把握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口头上承认对立统一原理,却没有深切理解也没有认真遵照这一基本原理,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把矛盾的两个方面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忽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的依存和转化。如强调制度的纯而又纯,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不能有私有制和其它分配制度,要集中就不敢说民主和自由,要计划就不能提市场,要集体利益就不能说自我利益,对敌我矛盾只强调斗争,不强调转化。

邓小平同志在认识和处理我国一系列现实矛盾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法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清的地步。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公有制与私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公平与效率、先富和后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计划与市场、改革发展与稳定、一国两制、自力更生与开放、开放与防止精神污染、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之间等被传统思维看成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在他的

视野中变成了互补、互依、转化结合的关系。他科学地把握了这些对立的两方面之间的同一与对立,恰当地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使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2 在对待苏联和东欧经验上,善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

过去我们只看到我国与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都是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点,没有看到各国国情的不同,没有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几乎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3];“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打破了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3 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上善于从对立中把握同一

他没有简单否定或者肯定资本主义的一切,而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同时又强调要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经验,积极利用外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他注意区分什么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什么是不同社会制度共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从而能够把借鉴与批判、对立与同一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陋颓废的东西。”^[2]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由于缺乏与国际商人打交道的经验,引进外国设备的价格偏高,人们对引进产生了畏难情绪。邓小平^[9]教育我们要往远处看,“外国人可能骗我们,也可能期负我们落后。比如一套设备,给你涨点价,或者以次充好,都是可能的。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国外资本家来华投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剥削必然存在。许多人害怕剥削,心理上拒斥外资,思想上顾虑重重,僵化思想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邓小平同志看得很远,他总结国内闭关锁国的经验教训,要人们从多角度看问题,不能仅仅看到存在剥削,更要看到外资能够加速和带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他说“多引进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5]“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3]“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

三、突破两分法模式,寻求解决矛盾的新思路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划分为两类,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种划分法对今天我们处理

一些国内问题仍有指导意义。但总体上看,两分法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有关,它明显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交往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实:(1)两分法对市场利益单元之间大量矛盾的调节已经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经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矛盾双方的关系已经不是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具有平等资格的法人之间的关系。对下级可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但解决具有平等地位的独立法人企业主体之间的矛盾时不能简单地运用这一方法。因为大部分矛盾的解决已经不是政府行为,而成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虽然政府实行宏观调控,但政府对各利益单元的调节已经主要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经济意义上的;已经主要不是依靠行政批评和指令,而是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法进行,政府已经不是调节社会矛盾的主体。(2)有一些矛盾既不能简单地归于敌我矛盾,也不能简单地归于人民内部矛盾。把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国内各企业之间,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敌我或者人民内部矛盾都不太准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是复杂多样的,即可以从矛盾双方的根本利益关系可以把矛盾划分为人民内部、非敌非我、敌我矛盾等,还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对改革的态度、作用范围、地位等方面进行划分,所以,两分法不能涵盖我们现阶段的一切具体矛盾。(3)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了解决矛盾的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在市场经济下处理矛盾的方法大体包括相互沟通、妥协、谈判;团结批评,自我批评与相互谅解;他人或团体居间调节;行政调节;司法调节等。市场机制成为调节矛盾关系的利益机制和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调节的作用和地位将不断加强,将成为调节人们关系的基本机制。所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已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模式,还要看到这一方式有它的局限性^[4]。按照两分法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有隔靴搔痒之感。(4)两分法使我们在分析矛盾时容易犯简单化错误,容易把什么问题都与政治联系起来,有单纯政治思维的偏颇,容易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些青年人和部分群众在反右斗争、十年文革中动不动对对方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机械理解和照搬两分法不无关系。(5)两分法不能用来指导我们解决国家与台湾省、港澳等特殊地方的矛盾,据此不能提出和实现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把我们与台湾的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都不恰当,都不利于我们实现祖国统一。

虽然邓小平同志没有明确提出关于新时期矛盾划分的新方法,但他在实践中灵活分析和解决矛盾的创见性思路表明了他实质上已经突破了两分法。如在解决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上,他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在处理与港澳台关系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3]k}。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总得用新办法来解决”^[1]。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上强调运用法律的形式,他认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这对毛泽东同志着重强调宣传和教育及行政处理是一个重要发展。

四 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中理解社会主义,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只注意了马列主义原理的普适性,忽视了马列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所有制、计划经济、分配方式、商品经济性质和作用的理论,搞一大二公,平均分配,否定市场经济;只注意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共性,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注意了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地经验和国外经验,没有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条件,盲目按照导师的个别结论行动,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他要求人们解放思想,首先要从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3]k}“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件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不同。”^{[3]k}“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k}“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结论集中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成为邓小平社会矛盾论的归结点。

参考文献

- [1] 梁 栋.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J]. 唯实, 2000, (3): 21- 23.
- [2] 邓小平文选, (1975- 1982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3]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4] 杨三省.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J].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0, (1): 2- 6.